

# 我不是一位旅行者

## ——社会工作者支援喀什残疾人培训再就业手记

刘敬文/文

在喀什机场,我跟一群旅行者一起走了出来,我们的装扮基本相同,背着大背囊,脑子里面装着一些零碎的知识:“这是中国最西边的一个城市,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,还有塔吉克、柯尔克孜族、汉族等31个民族聚居,与四个国家接壤。”

不过,我不是一位旅行者,至少在喀什我不希望扮演这个角色,我到喀什,是来帮助残疾人培训和就业的。我希望能够进入社区和他们的家庭,了解他们的就业需求和真实感受,而非用相机摄取一点景色,回到城市里自我安慰。在我来之前一个月,残友集团和郑卫宁慈善基金会五位残友同事和社工已经进驻了,他们招募了68位维吾尔族的残友。

的士还没到喀什残友的院子,已经远远能听到歌舞声。歌舞对于维吾尔族的朋友们来说,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,这是渗透在他们血液的东西,虽然大部分残友行动不便,但是他们在歌舞中的那种自得,让拘谨的我认为,他们是天底下最开心的人。

不过,当大家坐在一起跟我聊天的时候,我突然发现这是一种错觉。作为残疾人,他们跟我在全国各地的残友同事一样,有着惊人类似的经历和忧愁。我记录了这样的三位:

玛依拉。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,家庭环境也非常好,可是她身患了一种怪病,身上的皮肤不断蜕皮,也因此使得玛依拉总是处于发炎的状态,每天晚上,都需要把毛毯浇湿裹着身体降温才能入睡。身体的骨骼生长也受到影响。玛依拉从小没有进入过校门,可是她通过每天看电视学了一口流利的汉语,并偷偷拿弟弟的书完成了初中的课程。

克比努尔。她是玛依拉的朋友,很漂亮的女孩,小时候因为医疗事故导致小儿麻痹。她跟玛依拉一样,白天在家自学英文和汉语,晚上让弟弟抱出门口,坐轮椅到外面转转。

麦合木提江。他跟克比努尔一样,因为医疗事故致残,由于不想让家里负担过重,他自己到理发店做学徒,拄着拐杖给客人

“想依靠自己的双手吃饭,不想在家里听到母亲的叹息声,现在有这样的机会,愿意拼了命去争取。”

理发。有过一个老婆,但是很快离开了他。

当我问起他们加入喀什残友的原因的时候,答案几乎是一样的:想依靠自己的双手吃饭,不想在家里听到母亲的叹息声,现在有这样的机会,愿意拼了命去争取。

他们的答案让我想起勇哥(喀什残友董事长刘勇)的经历。12年前,在接触电脑13个月,勇哥拿到了世界残疾人网页设计大赛的第五名。勇哥说,到残友前,他去申请报亭经营都被人讥笑影响市容。对他来说,跟郑卫宁大哥一起创立残友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机会,可以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取。

接着,我们还聊起梦想。玛依拉说她的梦想是希望自己以后能痊愈,有个办公室,固定的工作。有个爱人,有个家。说起“爱人”的时候,她很羞涩,尽管她在维吾尔族女学员里是少数没有戴头巾的。

克比努尔的梦想是环游世界,我突然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没有离开过喀什100公里范围,少数出过远门的都是因为要去北京或者乌鲁木齐治病,我跟他们相约第二天去讲一节地理课。

地理课上,我手绘了一个中国地图,告诉大家,我来自海边的深圳。我问到看过大海的举手,全部都举手说:“我们看过,在电视里!”原来没有一个人去过海边,学员热彦古丽到过杭州,是曾经离大海最近的人,可是她去杭州是为了治疗她失明的一只眼睛,根本没有机会去看大海。

上完地理课,轮到维吾尔族兄弟给我上课。他们动手能力之强让我



去残疾人家访问

人惊讶,义工朱锐带来的摄影器材,没有任何人指导,他们在五分钟之内掌握了基本的拍摄原理,到处一顿狠拍。爱心人士捐赠的洗衣机,在没有装好入水管的时候,他们已经“土法”上马开始洗衣服。

跟大家上课的最大好处是,学员们开始叫我“蚊子老师”,有点汉语不好就叫“趴下老师”(维吾尔语的发音),他们开始跟我开玩笑,拉着我一起上去跳舞。

我也开始找到了旅行者之外的感觉,开始走入维吾尔族残友兄

弟姐妹的内心,感受他们的快乐和忧愁,对喀什不再停留在知识层面,而是了解这片土地上的具体一个人,最困难的一群人。

作为一名微博控,我频频把走入他们内心的感受编辑成140个字,我在此摘录两条:“这里的黄昏很美,像梵高调色板那一抹温暖和落寞,这里的天空蓝而高远,能够治愈我们心灵的感冒,这里的星星很多,像出来约会的眼睛。这里是喀什。我身边的这些维吾尔族朋友,很小的事情都可以乐很长时间,

听到音乐,不管有多少烦恼,都会抛掉起舞。”

“在喀什,跟维吾尔族残友打成一片,同吃同住,互相尊重,到他们家去做客。我像一位普通维吾尔人一样在生活,阳光照耀。”

作者简介:刘敬文,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、深圳市残友集团副总经理、深圳市关爱残友志愿者协会秘书长。



### “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策”

刘敬文

从喀什回来的这段时间里,我又重读了伊斯特利《白人的负担——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》,以书为引子想把在喀什半年的经验和困惑梳理一下,在去喀什之前,我也读了这本书,书里的一段文字让我十分惶恐:“在过去50年中,西方将2.3万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,却仍无法为孩子们买到价值12美分的药品,以减少全球一半的疟疾死亡案例;却仍无法为贫困家庭提供4美元的蚊帐;却仍无法为每位新生儿提供3美元的补助,来预防500万婴儿的死亡。如此充满同情的善举,却仍无法为急需帮助的人们带来实惠,这正是悲剧所在。”

以西方如此庞大的财力,尚且得到一个悲剧的结果,喀什残友,作为深圳援助喀什的一个残疾人帮扶项目,资金谈不上充裕,人员算不上齐备,半年后能够让68位维吾尔族青年安心集中接受各种就业技能(语言、计算机技能、手工艺)的培训,而来过基地的朋友都能

感受到这些残疾朋友大部分已经开始对生活怀有良好的期望。这个结果,让我的惶恐缓解了许多。

《白人的负担》的第一章直截了当指出,之所以花了那么多的美元都无法见效,是由于援助者通常都是大包大揽提出庞大的计划,有强大的自信和职业经历,而忘记了当地的贫穷是政治、社会、历史、制度、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问题。而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,通常是一些认为自己不了解情况,实地调查,发现一个具体问题,设计创新解决办法,并且最为重视本地化的人。

喀什残友项目实施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工作制度是家访,现在看来是非常明智的。家访制度能够坚持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,学员家分散,最远的有几十公里,刚开始我们只有一辆小三轮,语言不通,总之是困难重重。

也正是在家访当中,在与几十位维吾尔族残友家长的培训,而来过基地的朋友都能

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和困惑,很多情况是跟我们想象截然不同的。例如学员乌守尔·阿吉,他刚来的时候,表现吊儿郎当,参加培训也不认真,容易跟人起冲突。而在家访中我们发现,阿吉的残疾程度不重,他特别能干,家务农活都是一把好手,遇到事情特别有办法。回去以后我们马上对阿吉委以重任,有几个项目直接就让他负责,他不仅是最有责任心的,而且也是最有创新精神,项目都完成非常好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们做过最正确的事情是没有在去之前订下任何计划,我们必须在多长时间做怎样的事情,要解决多少人就业。美好的目标固然能激动人心,但是未必有利于实践的开展。华为任正非先生的名言“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策”,这句话在援建工作中也许更重要,把每一个项目要实现的目标进行评估,并且选择能够在最低成本上实现最高价值的那一个。



喀什残疾人参加联谊活动